

基本館藏

58495

論蘇聯北方各族人民 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 社會主義的問題

蘇聯 稱庫波夫斯卡婭等著



民族出版社

論蘇聯北方各族人民越過資本主義 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

蘇聯 雅庫波夫斯卡婭等著

蘇國華譯

民族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容提要

本摺是由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上譯的兩篇文章合編而成。這兩篇文章闡述了蘇聯北方各族人民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前一編着重批評了蘇聯某些學者對北方各族人民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的一些錯誤論點。後一編以具體生動的事例，敘述了蘇聯北方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建設日益上升的情況。

目 錄

- 論蘇聯北方各族人民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 雅庫波夫斯卡娅 (五)
蘇維埃北方各族人民經濟和文化的繁榮 克魯契寧 (三)

論蘇聯北方各族人民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

雅庫波夫斯卡婭

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的建立，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民族。斯大林在他的『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這部天才著作中，對社會主義民族的社會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並指出了社會主義民族和資產階級民族根本不同之點。社會主義民族是在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進程中形成的。社會主義民族的形成，是在實現列寧、斯大林消滅民族壓迫的政策的基礎上，是在實現不僅要在法律上消滅、而且要在事實上消滅各民族不平等的政策的基礎上，是在實現以友誼和兄弟般合作的精神來教育各族人民的政策的基礎上產生的。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的政黨是鞏固和領導蘇維埃社會主義民族的力量。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民族結合的過程，在我國歷史上佔了一個整個時代。社會主義民族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所消滅的那些舊的、資產階級民族廢墟上形成的。到十月革命的時候，尚未形成民族的那些部族，也同時走上了社會主義民族形成的過程。

共產黨為我國各族人民、以及那些尚未充分完成社會主義民族結合過程的部族，勝利地解決了從家長制和家長封建制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解決了使這些民族人民

免於遭受資本主義的災難。在我國所實現的從原始經濟形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是值得最全面與最深刻研究、調查和概括的對象。這種研究和概括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我們的國家是鼓舞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榜樣，是所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那些國家的偉大典範。

未及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發展成爲社會主義民族的這一形成過程，很清楚地說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很清楚地證明了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在我國所實現的列寧主義思想百戰百勝的力量。

但並不是所有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沒有來得及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各民族，現在都形成爲社會主義民族了。例如，在我國的北方和北高加索，除了蘇維埃民族外，還有一些蘇維埃部族，這些部族結成爲社會主義民族的過程尚未完成。但這些部族和十月革命前的部族根本不同。這些部族存在的基礎，正和我國各民族一樣，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些部族正積極參加到共產主義的建設中，他們只是在表現民族特徵的那些標誌的發展程度上和社會主義民族有所不同而已。

使具有家長制和家長封建制的各族人民能够結合爲社會主義民族的主要條件，就是黨和蘇維埃政權順利地完成了吸收這些民族，使之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就參加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任務。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說過：『共產國際必須確立和從理論上證明這一個原理，即落後國家在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過渡到蘇維埃制度，並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再過渡到共產主義。」●

很遺憾，各族人民從家長制和家長封建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形成爲社會主義民族的過程，直到現在爲止，仍未在我們的歷史著作中得到應有的反映。有些著作中甚至迴避這個問題。一九五〇年在雅庫特出版的「偉大俄羅斯民族對雅庫特民族發展的進步影響」一書就是一個例證。這本書對家長氏族制度殘餘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和在各民族結合爲社會主義民族的過程中，所起的阻礙作用全然避而不提。然而，正確闡明這個問題，對研究某些民族從家長制和家長封建制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是有相當重要意義的。正確闡明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必要，也是因爲直到現在爲止，某些歷史學家還有把家長制和家長封建制殘餘理想化的情形，並且還出現把由於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而產生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解釋爲氏族關係的直接延續、發展和綜合的這種傾向。

例如，安伊西莫夫在「埃文基人的氏族社會」一書中指出，當地居民所保留的原始生產組合形式，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有積極作用。托卡列夫在他的「厄魯特的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一書中，指出家長氏族殘餘的雙重作用，但還是傾向於把這些殘餘加以美化。他說：「這些傳統（指氏族傳統——作者註）是仇視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習慣，因此實質上是便於建立新的集體勞動方式。」●

● 「列寧全集」，第三一卷，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一九頁。

● 托卡列夫：「厄魯特的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第一四〇頁。

托卡列夫教授是這樣熱中於把家長氏族制度的殘餘理想化，他竟用這些殘餘的存在來解釋阿爾泰集體農莊的那種他認為很特殊的團結性，不惜把這些集體農莊和俄羅斯集體農莊對立起來。他說：『我不能忽略那個事實，即阿爾泰人的集體農莊，常常給人一種特別團結和鞏固的印象，在這方面往往超過鄰近的俄羅斯人的集體農莊。』

這些顯然錯誤的結論，我們本來可以不必再駁斥，因為這兩本書（安伊西莫夫和托卡列夫的著作）已經出版很久了，作者目前也許已經更改了自己的觀點，但有兩種情況迫使我們不得不這樣作。第一，這兩本著作是關於該問題的獨特的著作，青年們一直在學習這兩本書，而且這兩本書中所包含的許多錯誤觀點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懷疑。第二，安伊西莫夫和托卡列夫所表示的、關於氏族殘餘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的觀點，在最近的一些著作中也有時得到反映，例如，一九五〇年『蘇維埃人種學』雜誌第一期中發表一篇叫做『從氏族制度走向社會主義』的文章（是根據雅馬爾涅涅茨民族州的材料寫成的），該文作者布羅德涅夫認為氏族制度是集體農莊制度的直接基礎，而集體農莊則是氏族聯合的繼續發展。他說：『實踐證明，以同一個氏族的代表來建立集體農莊是沒有危險的，對這樣的聯合提心吊胆是不必要的。』在顯然公正地對那些集體農莊之一加以特別稱揚的同時，布羅德涅夫却正如托卡列夫一樣，傾向於認為這個集體農莊是由同一個

● 托卡列夫：『尼魯特的資本主義初期的殘餘』，第一四一頁。

氏族的代表所組成。在布羅德涅夫看來，集體農莊自治的形式，也就是從氏族自治形式中成長起來的。

當然，蘇維埃的實踐是容許建立把同一個氏族的代表們聯合起來的集體農莊，這樣的集體農莊常常是有，並很好地工作着。但是，是否可以根據這個理由來得出結論，說氏族制度就是在以往落後的部族中，特別是在北方部族中建立集體農莊的一個自然的基礎呢？在我們看來，這是完全不許可的，這種結論不是什麼別的，而是蘇聯歷史學者，特別是人種學者中間所發生的把氏族制度的殘餘理想化的想法。當然，並不是說所有的人種學者都犯了這種錯誤，例如，波塔波夫就十分正確地說明這些殘餘的作用，他說：「這些氏族習俗的保留，會嚴重地阻礙了阿爾泰人的社會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和這種制度所產生的文化力量，是能夠很迅速地消滅這些氏族習俗、解放個人，特別是解放婦女，使他們擺脫家長氏族的桎梏的……」。波塔波夫雖然很正確地提出和解決了氏族制度殘餘的作用問題，却沒有對那些把這種殘餘理想化的科學家們所作出的錯誤結論進行理論的和具體歷史的批駁。但是，這種理想化在客觀上是會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作出不正確的解釋，使人們輕視社會主義形式的國民經濟是人類歷史上所有一切形式中最高形式的意義。這種理想化還抹煞了許多民族和部族從家長和家長封建形式的國民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中所實現的巨大飛躍的概念。因

此，這種理想化在客觀上是輕視黨和蘇維埃政權在改造這些民族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我們看來，將家長氏族制度殘餘理想化，主要是由於個別學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指示，特別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俄國村社的言論沒有正確理解而產生的。大家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和其他著作中指出，在無產階級已獲勝利的國家與其援助的條件下，落後國家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發展到社會主義。但是，不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從來既沒有把農民村社，也沒有把氏族關係殘餘的任何其他形式，看作是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直接基礎；恰恰相反，他們作了極其清楚的指示，說明這種社會形態是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直接基礎的。恩格斯會說：『實際上，不論在什麼地方和在什麼時候，從氏族制度保留下來的農業共產主義，除了自身瓦解外，是不可能產生出任何其他東西的。』^①他接着又指出：『在商品生產和私人交易出現之前所產生的氏族公社的一切形式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共同點：某些物品，即生產資料是公有的，並為某些團體所公用。但這一個共同點決不能使最低級的社會形態，產生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②恩格斯曾強調指出：從氏族制度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一種質態變為另一種質態的巨大歷史性的飛躍，只有在一定的具體歷史條件下才有飛躍的可能。

● 「馬克思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冊，第三九二頁。
● 同上書，第三九三頁。

這種飛躍的主要條件，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上述的蘇聯學者們當然非常懂得列寧和斯大林對這個主要條件所作的指示，這個主要條件決定各民族能够由家長制和家長封建制不經過資本主義而過渡到社會主義。但在解釋這些指示時，這些學者往往有不確切的地方，這種不確切的地方也還是由於那種把氏族關係殘餘看作是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直接基礎的錯誤觀點。他們往往把俄國無產階級在消滅各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後現象所給予各民族的援助，說成主要是物質和文化上的援助，而忽略了基本的東西，即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而建立了蘇維埃國家，才有可能吸收我國過去最落後的民族和部族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當論及消滅各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和吸引落後民族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時，斯大林把建立、發展和鞏固蘇維埃國家，看作是以往落後民族越過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和決定性的條件。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消滅各民族事實上不平等的巨大歷史任務時，斯大林說：「這些非俄羅斯民族所特有的共同特徵，就在於它們從自己國家性的發展的意義說來，都落後於俄羅斯中央地區。我們的任務，就在於用一切力量去幫助這些民族、幫助它們的無產階級分子、勞動分子，用本族語言發展它們自己的蘇維埃的國家性。」●

斯大林這個一般性的指示，是完全適用於我國那些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還未

來得及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民族與部族的。

俄國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所建立的蘇維埃國家，成爲這些民族能循着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先決條件。俄國工人階級對我國以往落後各民族的偉大援助，首先正是表現在建立、發展和鞏固蘇維埃制度方面。我們的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對這種情況往往考慮得很不够。在某些場合下，特別是在一些介紹北方民族的個別著作中，他們甚至企圖把這些部族的蘇維埃國家形式的建立和鞏固，說成是氏族自治形式的某種進化。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由於沒有正確地了解黨和蘇維埃政權對那些還未來得及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民族，特別是對北方各民族的政策的緣故。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說道：『問題就在於，好多部族，主要是土耳其各族——他們約有二千五百萬左右——還沒有經過、沒有來得及經過工業資本主義的時期，所以，他們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因之，他們不得不越過工業資本主義，而由原始的經濟形態轉到蘇維埃經濟的階段。爲了進行這個艱巨的、但絕不是不可能的工作，需要估計到這些部族的經濟狀況的、甚至歷史過去，以及生活方式與文化的一切特點。把在這裏，在俄羅斯中央地區有效力和有意義的措施搬到這些部族的區域裏面來，那是不可想像的，而且是危險的。』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五五頁。

斯大林的這個指示，首先就證明了那些還保留着原始經濟形態的民族，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艱巨而複雜的過程，這是和認為由這些經濟形態所造成的一種「能够容易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某些學者的意見相反。在使這些民族轉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黨考慮到它們社會制度的一切特點，並未匆忙地去破壞這種社會制度。但考慮這種特點決不是說，在這些民族中間建立和鞏固蘇維埃國家，要走上脫離工人階級專政的一般發展規律的道路。在考慮每個民族和部族具體歷史上的發展特點的同時，黨實行了在我國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一般的總路線。從北方各部族的實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北方各民族的復興，他們變成建設共產主義鬥爭的積極參加者，他們在結合成為社會主義民族的過程中所得到的成就，乃是蘇維埃政權的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如果我們想一想由於美帝國主義者的駭人聽聞的剝削，美洲北部各民族所遭遇的可怕情況和死亡厄運；那末蘇聯北方各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偉大成就，就會顯得特別鮮明了。蘇聯北方各民族的復興，很清楚地證明了蘇維埃制度偉大的蓬勃力量，同樣也證明了蘇維埃政權對那些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各民族所實行的全力幫助政策，是與美帝國主義對這種民族所採用的消滅和殘酷剝削政策根本相反的。

改造北方各族人民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橫桿，決定他們能否停止死亡而變成富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部族，再逐步結合成為民族的基本條件，就是在他們那裏培植、鞏固和發展蘇維埃國家制度的基礎。北方各族人民在頗大程度內還保留着原始社會的經濟形態，他

們的特殊落後性，要求蘇維埃政權特別努力為這些部族創造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條件。在提出改造北方各族人民的社會制度的問題和實現這些初步措施上，卓越的功績是屬於斯大林所領導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在我們的歷史作品中，直到現在為止，對斯大林領導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所起的作用闡明得還不够。通常總是把蘇維埃政權幫助北方各族人民的初步措施和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成立的協助北方部族委員會一事聯繫起來，各種事件的敘述也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其實，早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委員會議上，就通過了關於成立管理和保護北方原始部落的專門分部。委員會的記錄中記載着：『在少數民族事務部管轄下，組成管理和保護俄國北方原始部落的分部，其機構中的兩個科學顧問，一人為分部主任，另一人為書記。分部的直接任務為：（一）按照原始部落的文化和生活特點與他們的生活條件，組織管理這些部落的機構；（二）保護原始部落免受一切剝削……（四）全面地研究當地部落的日常生活和經濟生活，以便吸引他們毫無痛苦地來參加蘇維埃俄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在認真考慮北方各族人民的一切生活特點的基礎上，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新文化——這便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所提出的實際任務。只有在建立了管理北方各族人民的新的蘇維埃形式的管理機構之後，才有可能實現這個任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一九二三年四月，

成立了隸屬於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協助北方部族委員會。

在着手成立北方蘇維埃管理機構的時候，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曾利用了許多學者和專家，特別是科學院的俄國種族成分研究委員會。成立蘇維埃機構，必須激發北方廣大人民羣衆的主動性和自動性，必須把他們從民族上層分子和財主的勢力下解放出來。為此，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召開了這些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北方各部族代表會議。

代表會議致斯大林的賀電中說道：「由列寧同志擔任名譽主席的，由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所召開的托博爾北方當地的各部族代表會議，在北極各族人民歷史上第一次表現了民族意志，指出了廣大的社會創造的道路。薩莫耶、奧斯嘉克、宰良卡、沃占爾等部族熱烈地擁護蘇維埃的民族政策。」

代表會議上提出了組織北方各部族管理機關的問題；並且當時就已經提出了在北方建立蘇維埃民族州的主張，但是那時候這方面所需要的條件尚未成熟。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活動，替北方人民生活的改造打下了基礎。一九二四年，由於為建立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準備條件的這個偉大歷史使命的順利完成，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便取消了。同年，成立了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管轄下的協助北方部族委員會。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下，協助北方部族委員會吸引北方各族人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及鞏固和發展他們的蘇維埃國家性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北方委員會所擬定的「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北方邊區各部族和各部落管理工作臨時條例」，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批准。正是對這個『條例』所作的不正確的解釋，使某些研究家能够作出不正確的結論，認為北方各族人民的蘇維埃形式的管理機構是氏族管理形式的某種進化。確實，『臨時條例』允許成立所謂當地氏族管理蘇維埃；但是同時，這個『條例』在建立蘇維埃政權機關的工作中，是奉行總的階級路線，不讓剝削分子參加到這些機關中。『條例』的第六個專門項目，明確規定了不容許各種各樣的剝削分子參加管理機關。因此，在全面地考慮到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特點的情況下，在這些民族的蘇維埃政權機關的建立工作中，階級路線曾被嚴格地遵守着。這乃是黨和蘇維埃政權為了使貧民脫離剝削分子而採取的一般路線的一個表現。

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指出：『在東方邊區中，階級分化政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不讓當地一切剝削分子來影響羣衆。在各個自治機關中同這些剝削分子進行鬥爭，用當地羣衆自動組成勞動者蘇維埃的辦法，來剝奪這些剝削分子的階級特權。』

建立氏族蘇維埃，是蘇維埃政權的一個臨時辦法，其所以要採取這個辦法，是因為必須不能強制地破壞氏族的形式，而用培養北方最貧困的一部份居民的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的新法，來克服這些形式。在爭取建立社會主義的整個鬥爭期間，黨和蘇維埃政權會不斷地實行

● 《聯共（布）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和代表大會、代表會議決議案彙編》，第一卷，蘇聯國家政治審
審出版局一九四一年版，第三八六頁。